

耶鲁笔记

刘文飞 著
Liu Wenfei



耶鲁和耶鲁大学

耶鲁斯拉夫系

拜访充和先生

林璎和她的「女生桌」

耶鲁与新英格兰

耶鲁与中国

在耶鲁译俄语小说

小镇哈姆登

列克星敦的战争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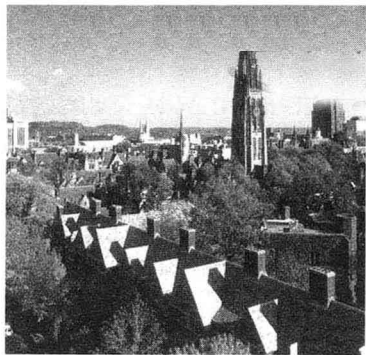
密大的「金苹果」

书馆

漓江出版社

飞
著

耶鲁笔记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鲁笔记/刘文飞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07-6776-1

I. ①耶… II. ①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7.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1746 号

丛书策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库文妍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0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目录 mulu

耶鲁和耶鲁大学	1
《耶鲁报告》和“耶鲁精神”	8
耶鲁的图书馆	16
耶鲁斯拉夫系	24
耶鲁教授托马斯	34
拜访充和先生	45
林璎和她的“女生桌”	55
老校园的三座雕像	62
东石山	69
耶鲁毕业典礼	76
耶鲁与新英格兰	81
耶鲁和纽黑文	87

94	耶鲁与中国
105	在耶鲁译俄语小说
112	小镇哈姆登
123	达特茅斯之行
132	在波士顿参会
147	垂钓长河
155	塞勒姆今昔
162	列克星敦的战争记忆
169	总统山和“疯马”像
177	《布罗茨基传》译后
183	《布罗茨基传》译者附记
191	安阿伯的“犯罪地图”
195	“阿尔迪斯”出版社
203	被召回的图书
206	密大的“金苹果”
211	《美国哥特式》
218	开曼岛上的图书馆
223	后记

耶鲁和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举世闻名，这所大学也使“耶鲁”这个姓氏流芳百世，尽管人们对这位威尔士商人或许所知不多，远不如他们对那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的熟悉和了解。

伊莱休·耶鲁（Elihu Yale）1642年出生在波士顿，父亲是来新大陆闯荡的威尔士人，伊莱休三岁时随父母返回英国，在接受了当时英国通行的教育之后，他继承父亲在英国殖民地建功立业的抱负，不同的是他选择的是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印度。经过一番奋斗，年近四旬的他官至马德拉斯省省长，并掌管东印度公司。他为大英帝国的利益奉献良多，自己在任上也私收官税，投机倒把，积累下大量财富，且对当地的印度原住民十分狠毒。1692年，他终因贪污腐败之名被免职。1699年他返回英国，用他自东方攫取的财富安度晚年，1721年在伦敦去世，享年72岁。他的长眠之地是祖籍威



耶鲁画像

尔士的莱克斯汉姆（Wrexham）。他的墓碑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镌刻着这样一首顺口溜似的诗：

生在美洲，长在欧洲，
到过非洲，婚在亚洲，
在亚洲生活很久；殁于伦敦，
好事做得更多；希望
他的灵魂借助仁慈升入天堂，
健在的你们读到此诗，
也该准备注定的离去，

祝福安宁，静默的泥土里

只有鲜花的盛开和芳香。

这则墓志铭既追溯了耶鲁的传奇一生，也总结了他的是非功过，的确是盖棺定论。

自“五月花号”（Mayflower）抵达美洲后，英国移民便开始在这片新大陆上“复制”英国的一切，就像他们把他们新踏足的那片区域称为“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将许多地名命名为“新伦敦”（New London）、“新约克”（New York，即“纽约”）一样，他们也想在当地创办与牛津和剑桥一样的大学。1636年，他们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同样名为“剑桥”（Cambridge）的地方创办了美国的第一所大学，当时名为“新学院”（New College），即后来的哈佛大学。在这之后不久，一群生活在康涅狄格州的牧师决定在该地也创办一所学院，但迟迟未获“办学许可”。直到1701年，康涅狄格殖民地议会才批准《自由建立大学学院法案》（*An Act for Liberty to Erect a Collegiate School*），那些牧师终于获得后来所谓的“耶鲁特许状”（Yale Charter）。于是，十位基督教公理会牧师聚集在当今天耶鲁校址附近一个叫布兰福德（Branford）的地方（其中一位牧师的家），每人带来自己的

藏书，共40本，面对这些知识的象征共同庄严宣告学校的诞生。这所学校起先称“大学学院”（Collegiate School），就设在首任校长家中，学校每年招收的学生仅区区数人，有时甚至招不到学生，举步维艰。恰在此时，哈佛大学第六任校长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 1639—1723）因宗教观不同与校方产生冲突，在他辞职后，他的儿子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继任校长的请求也遭拒绝，于是，父子双双转入大学学院。科顿·马瑟是一位大学者，美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正是科顿·马瑟出面联系伊莱休·耶鲁，让后者慷慨出手相助这座诞生不久、濒临倒闭的学校。

1718年，耶鲁给大学学院寄来九大包货物，校方将这批货物售出，得款562磅12先令，有了这笔钱，学校有了底气，便在当时新英格兰地区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纽黑文（New Haven）盖起校舍。与那些货物同时，耶鲁还捐出417本图书和一幅英王亨利一世的肖像。为了对耶鲁表示感激，经科顿·马瑟提议，大学学院正式更名为“耶鲁学院”（Yale College）。

人们总是习惯将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并称，于是，耶鲁似乎也就赢得了与哈佛（John Harvard, 1607—1638）比肩的地位。这两位捐资助学者均因其善举、义举和壮举而赢得

不朽，但他们两人间其实还是多有差异的：耶鲁比哈佛小35岁，出生在哈佛去世后的第四年，却比哈佛多活了41年，哈佛英年早逝，耶鲁寿终正寝；耶鲁是个精明投机的商人，心狠手辣的殖民者，而哈佛却是一个满怀宗教抱负、壮志未酬的年轻牧师；哈佛在临终前主动把自己的大半家产（779英镑）和所有藏书（400本）捐献给“河对岸那所新学院”，而耶鲁则是在别人的求助下才向大西洋彼岸的学校伸出援手，他的捐赠虽说在当时数目相当可观，但在其巨额家产中所占比例应该不会太大。或许正因为如此，两所大学对他们两人的态度后来也体现出某种微妙的差异，即哈佛被视为哈佛大学的“创始者”，而耶鲁则始终只是耶鲁大学的“捐赠人”。如今在哈佛大学校园中心区有一尊哈佛的青铜雕像，雕像下方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三行字：“约翰·哈佛，奠基者，1638”（John Harvard, Founder, 1638）。有人调侃说，这三行文字无一真实，因为：首先，哈佛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画像，也无后嗣，到人们打算为他造像时已无人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于是雕刻家便在校园里找来几位帅哥，将他们的五官优点结合起来，雕出了这尊坐像；其次，哈佛并非哈佛大学“奠基者”，而只是“捐资人”；最后，哈佛大学的创办时间是1636年，1638年是哈佛的去世日期，也是他的捐赠

时期。其实，这个“错误百出”的题刻或许恰好表达了哈佛人对于哈佛其人历史功绩的尊重和缅怀。

耶鲁人却似乎不愿重复哈佛人的此类“错误”。耶鲁生前位高权重，自然留有肖像画，可直到如今耶鲁校园里并无一尊耶鲁雕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耶鲁人对耶鲁的感念就次于哈佛人对哈佛的情感。1999年，美国的《美国遗产》杂志（*American Heritage*）曾将耶鲁评为“美国历史上最被高估的慈善家”（the most overrated philanthropist in American history）。此言不无道理，耶鲁既非耶鲁大学的创办者，亦非其最慷慨的捐赠者（在耶鲁之后捐款大大超过耶鲁的人为数甚多），他在捐赠之后似乎也与这所大学再无联系。但是我想，一代又一代的耶鲁人是不会赞同这个“结论”的，因为耶鲁早已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耶鲁这一姓氏能与一所大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首先自然由于那十位创办者的虚怀若谷，由于科顿·马瑟的竭力游说，由于耶鲁在学校最艰难时期的出手相助，但耶鲁的姓氏能代代相袭，一直被沿用至今，更是耶鲁人尊重历史、敬畏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种体现。当年，耶鲁在捐赠时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他在货物之外还捐赠了图书和画像，这构成一种象征，即大学就应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合

耶鲁校徽，上方的拉丁文
意为“光明和真理”。



成；这也同时形成一种传统，即人文和艺术教育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耶鲁大学对于人文和艺术学科的重视和投入在世界名校中仍是独占鳌头的。

如今人们遇见“耶鲁”（Yale）这个单词，若无其他补充说明，他们一定认为是指耶鲁大学而非耶鲁其人。耶鲁的捐助造就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耶鲁的传统和精神，反过来，耶鲁大学后来的发展和成就也塑造了耶鲁，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耶鲁这个人的身份和境界。耶鲁和耶鲁大学间的相互关系既是一段佳话，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启示。“耶鲁”这个鲜为人知的威尔土地名，因为耶鲁的闯荡而成为一个曾被带往各大洲的人名，最后又因耶鲁的捐赠而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校名，从而构成一个不朽的传奇。

《耶鲁报告》和“耶鲁精神”

耶鲁大学被视为牛津大学的翻版，校园的建筑大多是哥特式，学校的识别色是深蓝，教授授课必须着正装，校园里教堂密布，再加上那一个个总是大门紧锁、状似修道院的“学院”（College），它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传统和严谨，甚至是固执和保守。如果说，它通过往石墙上泼洒硫酸来“做旧”建筑、有意在窗户玻璃上砸出裂缝来刻意营造“历史感”的“建筑手法”曾招来嘲讽，它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招收本科女性的性别歧视曾饱受诟病，那么，它在教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方面的某些坚守，如今却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一片称赞。在这一方面最令耶鲁人骄傲的，就是曾在美国、乃至世界大学教育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耶鲁报告》（*Yale Report*）。

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生产的进步，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掌握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越来越受欢迎。此时的美国高校仿照德国高校

的做法，纷纷开设一些注重实用性的应用学科，与此同时，某些看似“无用”的学科和学问之存在合理性却遭到质疑，比如所谓的“死语言”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素以这些“古典学科”为骄傲的耶鲁大学，不仅不对这一大学改革浪潮让步，反而在当时的校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 1773—1867）的倡导和参与下于1828年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耶鲁报告》全称为《关于博雅教育的一份报告》（*A Report on the Liberal Education*），它洋洋数十页，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戴校长亲自撰写，这位身为哲学教授的校长对本校的教学方案进行了一番考察和分析，论述了“博雅教育”的本质和意义；第二部分由詹姆斯·金斯利教授（James L. Kinsley）执笔，主要是为古典学科辩护，论证保留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份报告后在《美国科学和艺术学刊》（*American Science and Art Journal*）上刊出，产生重大影响，基本上阻止了美国高校偏重实用学科的功利主义教学倾向。

对于“博雅教育”的认识和评判，构成了《耶鲁报告》的核心命题。所谓“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关键在于其中的“liberal”，这个词有“慷慨”、“大量”、“自由”等多种含义，因此Liberal Education也就有了多种汉译，

如“博雅教育”、“文科教育”、“人文教育”、“文化教育”、“自由教育”、“普通教育”、“广泛教育”、“通才教育”、“通识教育”等等。译名如此之多，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此种教育所具有的“广博”性质。英语中传统的“文科”就称为“Liberal Arts”，主要指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相当于汉语中的“文史哲”，它所对应的就是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换句话说，博雅教育教给学生的是没有眼前实际用途的知识，而非博雅教育则向学生传授那些能立竿见影的实用能力。一所大学，一所优秀的大学，其着眼点究竟应该放在学生外在技能的培训上还是他们内在修养的提升上？它的使命究竟在于批量地训练“匠人”还是精心地塑造“文人”？它的办学目的究竟在于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工具”和“螺丝钉”，还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养出更多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独立存在意识的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如今仍在困扰着中国大学的教育难题，近两百年前发表的《耶鲁报告》业已给出明确的答案：“没有任何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里为本科生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应包括职业技能，专门化教育必须更晚开始。”大学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为更高

层次的教育奠定基础”，这种基础教育“应该是广博的、深入的、坚实的”，“在智力培养中有两点极其重要，即对心智的训练和教养；训练在于拓展心智的力量，教养在于用知识丰富心智。前者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心智的训练能使学生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通俗地说，一个在大学校园里接受广泛教育、获得充分发展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更高意义上的对于社会有用的人。自那以后，一定程度上的“重人文轻实用”也似乎构成了耶鲁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是他们很乐意示人的一种姿态，比如，在现今的耶鲁大学网站上我们仍能看到刚刚卸任的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的这样一段话：“教育人们服务于社会，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集中于让学生掌握实用性的技能。耶鲁追求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广、自由的教育场景，而非一种狭隘的职业性教育，以便使他们具备领导才能和服务意识。”

在那场捍卫古典学科的运动中，耶鲁大学注重传统、固执保守的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是，在耶鲁大学300余年的历史中，它也曾多次表现得十分反传统。如今提到所谓的“耶鲁精神”（Yale Spirit），耶鲁人常常会作出这样的归纳，即面对社会的责任感、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和崇尚独立人格，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即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意识。

在言及“耶鲁精神”的养成和发扬时，耶鲁人最津津乐道的可能是这样几个事件：

首先是1763年关于耶鲁大学究竟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性质之争。在第五任校长托马斯·克莱普（Thomas Clap, 1703—1767）任期之内，耶鲁学院与康涅狄格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地方当局开始越来越多地插手学校事务，地方当局依据康涅狄格殖民地议会1701年10月9日通过的《自由建立大学学院法案》认定耶鲁大学属于“州立”大学，应当接受地方当局的管理。克莱普校长提出诉讼，理由是在州法案颁布之前，耶鲁的十位奠基者已经成立了这所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学校。凭借丰富的法律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他终于维护，或曰正式谋得了耶鲁大学的“私立”身份，他甚至为此悄悄地将耶鲁大学的成立年份往前挪了一年，定在1700年。如今，尊重历史的耶鲁人仍将学校的诞生日定在1701年10月9日，即殖民地议会通过建校法案的那一天，但对于他们那位校长手段高明的“计谋”，耶鲁人却大多表示认同和欣赏，因为他捍卫了耶鲁的独立地位和自主精神。

其次是越南战争期间发生的一场风暴。当时担任耶鲁校长的金曼·小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 Jr., 1919—1988）